

# 新出曾國青銅器瑣談

張懋鎔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本文根據近年流散的曾侯寶青銅器，並結合以往出土的曾侯青銅器，梳理出兩周時期曾侯青銅器的發展脈絡。其意義在於：第一，春秋早期的曾國青銅器組合形式承襲西周晚期特點，與中原青銅器還是很接近的；第二，可以認為從春秋早期到春秋晚期曾國國都還在隨州；第三，種種證據有助於說明曾國是隨州地區最大的諸侯國，曾國就是文獻記載的那個隨國。本文同時介紹新發現的曾仲臺方座簋以及葉家山曾國墓地 46 號墓出土的兩件尖刺乳釘紋盆式簋，這兩種非常特別的銅簋出現在曾國墓地，說明在西周早期隨州地區與寶雞地區交流頻繁，曾國與西周王朝關係密切。

**關鍵詞：**曾國 曾侯 青銅器

## 一、曾侯寶銅器

最近出版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以下簡稱《商周》)著錄有幾件曾侯寶銅器，十分重要。<sup>1</sup>先介紹如下：

### 1、曾侯寶鼎 (《商周》02219–02220，圖 1)

通高 30 釐米、口徑 36.5 釐米、兩耳間距 40.8 釐米。口微斂，寬平沿，一對附耳高出器口許多，鼓腹，圜底，下置三蹄足，內面裸露範土。器腹上有一周箍棱，箍棱上飾竊曲紋，下飾垂鱗紋。內側壁鑄銘文 22 字 (圖 2)：「隹 (唯) 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寶擇其吉金，自乍 (作) 隅 (升) 鼎 (鼎)，永用之。」

### 2、曾侯寶簋 (《商周》04975–04976，圖 3)

通高 20.3 釐米、口徑 20.2 釐米、腹深 10.3 釐米。斂口，鼓腹，圈足外撇，一對獸首耳，獸耳外端上翹，蓋面隆起，上有圓形捉手。蓋沿飾重環紋，口沿飾竊曲紋，蓋面和腹部飾瓦楞紋，圈足飾夔龍紋。蓋內鑄銘文 22 字 (圖 4)：「隹 (唯) 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寶擇其吉金，自乍 (作) 飰簋，永用之。」

### 3、曾侯寶圓壺 (《商周》12390，圖 5)

通高 54 釐米、口徑 18.6 釐米。侈口，束頸，鼓腹，圈足外撇，頸部有一對獸首銜環耳，蓋冠作蓮瓣形，蓋頂未封。蓋沿飾 S 形夔龍紋，頸部飾環帶紋，上腹飾蟠螭紋，圈足飾垂鱗紋。蓋樞鑄銘文 22 字 (圖 6)：「隹 (唯) 王五月吉日庚申，曾侯寶擇其吉金，自乍 (作) 尊壺，永用之。」

據《商周》介紹：「傳同坑出土數十件青銅器，目前見到 18 件，鼎 6、簋 5，簠 2、方壺 2、圓壺 1，盤 1、匜 1，除器名外，銘文基本相同。」則曾侯寶至少應擁有 7 鼎 6 簋，與河南三門峽上村嶺

1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圖 1 曾侯寶鼎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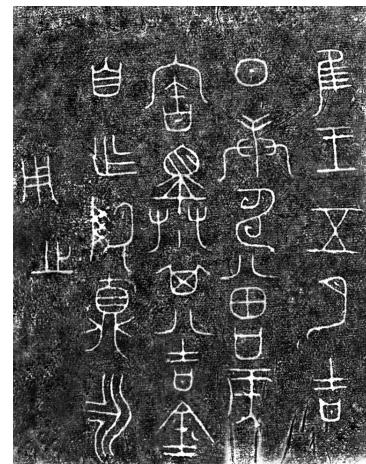


圖 2 曾侯寶鼎拓本



圖 3 曾侯寶簋圖像



圖 5 曾侯寶壺圖像



圖 4 曾侯寶簋拓本



圖 6 曾侯寶壺拓本

M2001（虢季墓）出土的鼎簋數目一樣。<sup>2</sup>

關於這批青銅器的年代，《商周》置於春秋早期，是正確的。考慮到曾侯寶圓壺上已出現蟠螭紋，可將它們放在春秋早期偏晚。

在曾侯寶器群出現之前，關於曾侯的銅器有如下幾批：

#### 1、西周早期的曾侯青銅器：

曾侯諫鼎 4 件（葉家山 M65:44、47，M2:5、6）、曾侯諫簋 1 件（葉家山 M2:1）、曾侯諫簋 2 件（葉家山 M2:9，M65:49）曾侯方鼎 2 件（葉家山 M27:23、26）。<sup>3</sup>

#### 2、春秋早期的曾侯青銅器：

曾侯簠 1 件（集成 04598），器主為曾國國君，約與楚成王同時（公元前 671– 前 626 年）。

曾侯鷙伯戈 1 件（《商周》16865）。

#### 3、春秋晚期的曾侯青銅器：

曾侯饗，見曾侯乙墓出土曾侯饗戟 4 件（《集成》11178–81），即位前稱曾子饗，有曾子饗簠 2 件（《集成》04488–04489），曾子饗缶 1 件（集成 09996）。

曾侯鄖 1 件鼎（《商周》01577），曾侯鄖簠 1 件（《商周》05760），義地崗出土。曾侯鄖用戈 1 件（《集成》11174）、曾侯鄖行戟 3 件（《集成》11175–77）、曾侯鄖戟 3 件（《集成》11096–98）、曾侯鄖殳 1 件（《集成》11567）。

#### 4、戰國早期的曾侯青銅器：

曾侯乙鼎 9 件、鬲 2 件、簋 8 件、簠 4 件、豆 3 件、匕 3 件、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11 年第 11 期，頁 9–10、12–14。〈湖北隨州葉家山 M65 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1 年第 3 期，頁 9–16。

盤 2 件、匜 2 件，尊盤 1 套、壺 4 件、鑒 1 件、缶 3 件、鐘 64 件等。<sup>4</sup>

除了西周早期的曾侯銅器與戰國早期的曾侯銅器形成規模以外，其他時期的曾侯銅器少且零碎，曾侯寶器群的出現，承上啟下，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而言有以下三點：

1、曾國青銅器組合形式承襲西周晚期特點，與河南三門峽上村嶺 M2001（虢季墓）的食器（7 鼎、6 簋、2 簋、8 築、1 簄、4 盞、2 豆）、酒器（2 方壺 2 圓壺）、水器（盤、匜）的組合形式接近。<sup>5</sup>當然由於曾侯寶器群已經失散，是否還有鬲、甗、盨、豆、孟，不得而知，但總體上二者接近，說明在春秋早期，曾國國君的青銅禮器組合形式與中原的諸侯國國君的青銅禮器組合形式相近。

從以往出土的曾國青銅器來看，在春秋早期的曾器中一直未見簋，直到春秋晚期始出現。這一點似乎與虢國等中原諸侯國的青銅器組合形式有別。傳世銅器中有一件曾侯簋，年代在春秋早期，可能因為器物遺失，僅存拓片，這件銅簋並未引起足夠的關注。如今曾侯寶器群中有簋，說明在春秋早期曾國與中原地區其他諸侯國一樣使用簋，可能簋的級別高，早期只在曾國國君的墓葬中出現。

從以往資料來看，中原地區在春秋時期流行方腹壺，而在春秋曾器中，方壺較圓腹壺要少。如今曾侯寶器群中有 2 件方壺、1 件圓壺，有助於說明當時方壺也不少。或許方壺的級別高，早期只在高規格的墓葬中出現。

以上可以說明，在春秋早期，曾國的青銅禮器及其組合與中原青銅器還是很接近的。

2、對曾國國都所在地的推測。上世紀 70 年代在隨州擂鼓墩發現曾侯乙墓，由此可知戰國早期曾國國都在隨州。近年來在隨州葉家山發現曾侯諫墓，由此可知早在西周早期，曾國的國都就在隨州。問題是西周中期到春秋晚期，曾國的都城還在隨州嗎？在隨州義地崗多次出土曾國墓葬與曾侯青銅器。如 2011 年 9 月對義地

4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三門峽虢國墓》。

崗 M6 進行發掘，出土曾公子去疾銅禮器一組 10 件。<sup>6</sup> 據《武漢晨報》2012 年 11 月 5 日刊載消息稱警方追繳一批青銅器，來自隨州義地崗古墓群，其中就有一件曾侯寶鼎。這說明至少在春秋早期，曾國國都已從葉家山遷到義地崗。聯繫 1994 年隨州東風油庫 M2 出土春秋晚期的曾侯銅器——曾侯鄖鼎而東風油庫屬於義地崗墓地，<sup>7</sup> 可以認為從春秋早期到春秋晚期曾國國都還在隨州。2012 年 9 月 20 日我到達隨州義地崗，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葉家山草地考古發掘總領隊黃鳳春正在發掘。聽他介紹，這裏有一處規模宏大、等級頗高的墓地。如此看來西周早期曾國在隨州立國，從春秋早期至戰國中期為楚國所滅，曾國國都始終在隨州。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西周中晚期曾國國都在哪裏？從葉家山墓地來看，下限在西周早中期之交，大致在周昭王南征失利之後，那麼作為姬姓的曾國會不會因此而喪失在隨州的地盤，都城搬遷呢？有這種可能，但是不大。在西周中期，楚人的勢力還沒有擴張到隨州。同時，隨著與曾國同在隨州的鄂國被消滅，曾國在隨州成了唯一的大國，它為甚麼要撤出隨州呢？判斷曾國在西周中晚期是否還在隨州，對下一步在隨州尋找這一時期的曾國遺存，具有積極意義。

3、如果以上所說能夠成立，那麼從西周到戰國的五、六百年間，曾國國都始終在隨州。曾侯的墓地並不局限在隨州的某一地點，在葉家山、義地崗、擂鼓墩等地都有，範圍較廣，而且出土了這麼多青銅器，將來還會出土很多青銅器，這都顯示出曾國始終保持著較強的國力。這一切有助於說明曾國是隨州地區最大的諸侯國，曾國就是文獻記載的那個隨國。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義地崗曾公子去疾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2 年第 3 期，頁 5–15。

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隨州義地崗曾國墓 1994 年發掘簡報〉，《文物》2008 年第 2 期。

## 二、曾國方座簋

方座簋在曾國青銅器中顯得很特別。

先是在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出土方座簋，M27 與 M50 各出一件。這兩座墓都是大型墓葬。M27 墓室面積 32.8–33.7 平方米，是現已發掘的最大一座墓葬，M50 墓室面積 22.9 平方米。<sup>8</sup> 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僅有的兩件方座簋均出在大墓中，說明了方座簋的重要性。

《商周》著錄有曾仲臺方座簋 3 件（05029–05031，圖 7），形制、紋飾、銘文相同，大小相若。通高 27.8 釐米、口徑 21.2 釐米、腹深 9.4 釐米、座高 9.3 釐米、座寬 11.8 釐米、座長 19.3 釐米。侈口，束頸，鼓腹，矮圈足下連鑄方座，一對獸首耳，獸耳外端上翹，蓋面隆起，上有蓮花瓣形捉手。蓋面、腹部和圈足均飾形象不同的環帶紋，沒有地紋。蓋、器同銘，各 24 字（圖 8）：「隹（唯）王正月士〈吉〉日庚申，曾中（仲）臺擇其吉金，自乍（作）薦簋，其永寶用之。」蓋銘在捉手內。



圖 7 曾仲臺方座簋圖像



圖 8 曾仲臺方座簋拓本

<sup>8</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11期，頁16–19。〈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頁40–41。

我在〈介紹兩件春秋晚期青銅器〉一文中，<sup>9</sup>談到《商周》尚未著錄的一件同人之器—曾仲臺鼎。目前所知曾仲臺的銅器，除了上述1件鼎、3件簋，還有1件曾仲臺鬲（《商周》02862），2件曾仲臺簠（《商周》05930–5931），共有8件，有鼎、鬲、簋、簠，全部是飪食器。從簋的數量來看，曾仲臺至少是享有5鼎4簋的大貴族。

曾仲臺方座簋的年代在春秋晚期。方座簋興起於周初，流行於西周時期，春秋時期方座簋已很少了。據不完全統計，西周時期有113件，春秋時期有23件。<sup>10</sup>在這23件方座簋中，像曾仲臺方座簋這樣4件一組的方座簋是很少的。

戰國時期的方座簋有30件。大部分為楚系青銅器，出在國君（曾侯、楚王）的墓葬中。曾侯乙墓出土曾侯乙方座簋8件。

曾國的方座簋有幾個特點：

第一，從葉家山出土西周早期的方座簋到戰國早期的曾侯乙方座簋，時間延綿達五、六百年，其形制幾乎沒有大的變化，簋體均作敞口、束頸、鼓腹形。直到春秋晚期，曾仲臺方座簋上還是裝飾在西周銅簋上常見的環帶紋。可見在上層社會，其保守舊制的文化指向是十分明顯的。同時，也反映出曾國文化的穩定性。

第二，相比中原地區的方座簋，曾國的方座簋不僅數量多，而且在形態與紋飾上也有所改進與創新。例如曾仲臺方座簋，比起輝縣琉璃閣甲、乙墓出土的無耳方座簋，要有特色。腹與方座所飾紋飾，粗看是環帶紋，細看則是由雙頭龍紋交纏而成，是將兩種不同的紋飾組合而成，別有情致。蓮瓣形蓋是中原地區的特點，但此時中原簋上很少用。

第三，從西周早期到戰國早期，曾國的方座簋也在發展中。在葉家山墓地，一座墓只出一件方座簋。那時的方座簋還很少，通高不到22釐米。到了春秋晚期，曾仲臺方座簋以4件一組的形式出現，通高達到27.8釐米。儘管曾仲臺還不是國君，但說明方座簋在

9 張懋鎔：〈介紹兩件春秋晚期青銅器〉，收入呂建中編：《第三屆民辦博物館發展西安論壇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10 任雪莉：《商周青銅簋整理與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草稿），2013年。

曾國禮器系統中的地位已經很穩固。進入戰國時期，曾侯乙擁有 8 件一組的方座簋。在墓中，方座簋與束腰大平底鼎、牛形鈕蓋鼎排在一列，通高超過 30 釐米，可見其地位之高。曾國方座簋的持續發展與商周方座簋的漸趨衰落是相反的，這個現象值得重視。一個原因是從西周早期以來，曾國青銅器一直受到西周王畿地區（包括寶雞地區，那是方座簋的產地）青銅器的影響；二是禮失求諸野，當王畿地區很少使用方座簋時，較為偏遠的諸侯國反而用得多。可能還有其他原因。

### 三、尖刺乳釘紋盆式簋

葉家山曾國墓地 46 號墓出土的兩件尖刺乳釘紋盆式簋（圖 9），很值得關注。（M46:17）簡報〈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一文有簡短介紹，口徑 23.2–25.5 釐米、腹深 11.9 釐米、圈足徑 17.2–18 釐米、高 16.1 釐米，重 2035 克，但沒有給出圖像。<sup>11</sup>2012 年 9 月 20 日承蒙黃鳳春隊長邀請，我在隨州市博物館庫房中看到這兩件銅簋，如此眼熟，一望便知是陝西寶雞地區的特產。

這種簋造型並不複雜，均為敞口，窄平沿，方唇或尖唇，器身呈深腹盆狀，下腹圜收，圈足較高；外表也不精緻華麗，頸下多飾夔龍紋，以雲雷紋襯底，但主紋與底紋位差不大，所以凹凸感不強。器腹是數排交錯的尖刺乳釘紋，有的乳釘紋以斜方格雲雷紋襯底，雲雷紋也很粗疏。一般高度約在 16–18 釐米，最高的不超過 20 釐米，最低的不少於 16 釐米。（葉家山出土的兩件尖刺乳釘紋盆式簋是其中較小者。）這是一種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銅簋，主要出在陝西。根據最新統計資料，可知陝西出土了大約 60 件尖刺乳釘紋盆式簋，主要出土在寶雞地區。其中寶雞市區 23 件（戴家灣 11 件，石嘴頭 4 件，桑園堡墓地 4 件，賈村、石橋、峪泉、下馬營各 1 件）岐山 9 件，鳳翔 8 件，扶風 3 件，隴縣 2 件，共 45 件，佔總數的

<sup>11</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 年第 7 期，頁 43。



圖 9 乳釘紋簋

75%。從數量上看，寶雞地區無疑是這種尖刺乳釘紋盆式簋的重要產地。<sup>12</sup>

關於這種簋的文化屬性，除了上面已經談到的它們在形制、紋飾上的特點外，還可以補充兩點：第一，簋上都沒有銘文，自然也看不到日名或族徽，我們已經說過，這排除了它們是商式銅器的可能性。在 2011 年 6 月發掘的石嘴山墓葬中，出土的日名族徽銅器很多，但它們多是外來的器物，真正代表墓葬主流文化的是 4 件乳釘紋盆式簋，而上面恰恰沒有日名或族徽。第二，與商式銅簋相比，鑄造技術還是要落後一些。例如器壁比較薄，出土後多有所變形，個別器物上還有砂眼或二次補鑄的痕跡。大致可以判定，寶雞地區出土的這種銅簋就是在本地鑄造的，它們的使用者也很可能是包括周人在內的西部國族。

鄒衡先生早在 30 年前就指出它們多見於關中地區先周時期的墓葬中，年代大致在商末周初之際。這一觀點已普遍為學界所接

<sup>12</sup> 任雪莉：《商周青銅簋整理與研究》附表二·甲類 B 型簋統計表，論文尚未刊佈，承蒙應允先行使用，謹表謝意。

受。<sup>13</sup>而後，日本學者武者章也發表文章，指出這種形式的銅簋絕大多數都出在以岐山為中心的半徑 100 公里的範圍內，說明周原一帶在殷墟四期的時候已經擁有自己的鑄銅作坊和鑄銅技術。<sup>14</sup>從乳釘紋盆式簋的分佈範圍來看，最北已到河北天津、遼寧喀左等地。在隨州葉家山的乳釘紋盆式簋沒有發現之前，乳釘紋盆式簋基本沒有南下越過黃河，如今它竟在靠近長江的隨州出現，這是乳釘紋盆式簋分佈範圍的最南端。這種非常特別的銅簋出現在曾國墓地，說明在西周早期隨州地區與寶雞地區交流頻繁，曾國與西周王朝關係密切。

13 鄒衡：〈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 年），頁 316、317。

14 武者章：〈先周青銅器試探〉，《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09 冊（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9 年），頁 176–177。

# Notes on Newly Unearthed Bronze Vessels from the State of Zeng

ZHANG Maor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Relying upon the various bronze vessels of Marquis Bao of the Zeng state and those of the Zeng Marquis that have been previously unearthed, the present essay is intended to outli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onze vessels of the Zeng state marquis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Zhou dynasty. Three aspects of significance may be observed. First, the combined form of the Zeng State bronze vessels dating from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heri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dating from late Western Zhou times; the former are very similar to the bronze vessels of central China. Second, it may be assumed that the capital of the Zeng state remained in Suizhou throughout the early to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ird, various evidence supports a theory that the state of Zeng was the largest feudal state in the Suizhou region, and that the state of Zeng is the same as the state of Sui in written records. This essay also introduces two sets of vessels: (1) the newly discovered Zeng Zhong Yi *gui* pot with a square base; and (2) the two basin-shaped *gui* pots with sharp nipple cast patterns, which were unearthed from tomb 46 of the Zeng State graveyard in Yejiashan. The discovery of these utterly unique bronze *gui* vessels in graveyards of the Zeng state illustrates the frequent contact between the Suizhou and Baoji regions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Zhou period, and also reveal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of Zeng and the Western Zhou regime.

**Keywords:** State of Zeng, Marquis Zeng, bronze vessels